

朝鲜战场上的“电波站”

我1949年2月参军入伍。入伍后经过培训成了一名通讯兵。1951年3月,我被调到解放军炮七师20团任报务员,并随军赴朝鲜作战。从此,以电波形式参加战斗。

电波能“杀敌”

1952年夏天,我们炮20团转战到朝鲜松洞附近,指挥所设在一个大山沟里。根据汇报的情况,团首长叫我们通讯股向师部发一份电报:“根据最新侦察到的情况,敌人有向我前阵地移动的迹象,请示将原定作战时间,提前开始。”可是,电台又在山沟的坑道内,电波信号不好,电报发不出去。贻误战机可是大事。怎么办?当时团通讯股有4部电台,我是功率最大的电台台长,我就自告奋勇说:“把这部电台搬到山坡上去吧,到高处发报,准能发出去。”于是,我们台的8个同志一齐动手,快速向山坡搬运电台器材。

恰巧在这时,忽然阴云密布,狂风大作,瓢泼大雨从天而降,我们只好冒雨搬运。来到山坡的松林中,我们先砍一些粗树枝埋在地下当顶柱,再弄些粗细不等的树条,用草绳绑结实,做成1.3平方米的顶盖,搭成一个“小棚屋”。然后,我们8名战士脱下上衣,盖在



图/文无关

“小屋”上。最后,把电台放在“小屋”内。我一边擦脸上的雨水,一边发电报。因为全身都被淋湿了,发电报时电键漏电,手麻得难受,但我仍然坚持下去,直至把电报发完。

当我向一、二营发完电报后,突然遭到了敌人猛烈炮火的打击。原来,敌人用“测向仪器”测出了我电台的位置。炮弹就在电台周围爆炸。因炸弹过于密集,连电台周围的松树也着了火。我一方面命令

有关同志撤离,一方面继续向三营发报,直至完成任务。此时,只剩我一人在山坡上,我抱起电台,飞快地往山下跑。“轰”的一声,一发炮弹在我身边不远处爆炸,我被“土浪”和气流打倒,咕咚滚下山去。滚到山沟底部时,我只是受了点皮肉伤,但怀里还紧紧抱着我的“宝贝电台”……由于各营按新的作战命令,准确地向敌人发射了数百发炮弹,为步兵兄弟创造了良好战机。

电波能“救己”

我们炮七师赴朝后,正赶上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。上级的作战意图是,快速从中间路线向敌人纵深

处推进一大段距离,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后,再把阵地巩固下来,最后歼灭两侧的敌人。我们炮20团配合步兵作战,战场向南推进得很快。当时我们想,照这样打下去,很快就能越过“38线”,把美国鬼子打回老家去。

但是,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。我军从中间路线进攻时,他们没作顽强反抗,而是顺势后退,有生力量并未有很大的损伤。与此同时,东西两侧的敌人,却顺山岭迅猛向北跑,去包抄我军“后路”,想形成“口袋”,将我军歼灭在狭长的山岭谷地之中。这天晚上,当我们团正准备向南转移时,突然接到上级一份急电,内容是:命令你部停止前进,速到某某地域集结待命。

机要股长老谷拿着电报飞快送给团长。团长一看懵了,指着地图说:“这个地方不在前(南)面,而在大后(北)面,这不是让我们向后撤退吗?这绝对不符合原来的作战意图。”团长、政委指着老谷质问:“这是真的吗?是不是译错了电文?”老谷吓出一身冷汗。错传命令,会贻误战机的啊!他迟疑不决。团长拿起电报,命令道:“你再回去查一查,看看是不是真的错了!”老谷一把拿过电报,飞也似的跑到电台室。经查后,发报员王义成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绝对没有错。”老谷将查对的情况向团首长汇报后,部队迅速向北转移。当全团到达上级指示地域时,敌人已将“口袋”包围严实,但我们全团已在“圈外”。事后,团首长十分感慨地说:“如果没有那份电报,我们被敌人扎在‘口袋’内,那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。”这就是朝鲜战场广泛流传的“一份电报救了一个团”的真实故事。

(据《老人报》)

明清时期,“关节条子”是科举考场最时髦的作弊手段。条子满天飞,科场风气糜烂不堪。但夜路走多了总有一天碰上鬼,晚清戊午科场案,就因为16两银子而断送了一名宰相的性命。

清朝咸丰八年(1858年)戊午年是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。八月初六日,按照安排,皇帝钦点了此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和副主考官。主考官是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柏俊。

此次顺天乡试整个考试过程比较顺利。发榜后不久,咸丰帝认为主考官柏俊功不可没,升其为大学士。这样,柏俊就成了正一品的大员。清代不设丞相,一般认为,兼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已具有了宰相的地位。然而,就在柏俊接受同僚祝贺的时候,士子中间却开始了一场议论。原来,士子们在看榜时,发现唱戏的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。按清制,娼妓、优伶、吏等不能参

弊案展开调查。

会审团在审查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时,发现推荐他的考官有舞弊行为。这个罗鸿绎为了今后的升迁奠定基础,决定参加今年的顺天乡试。是年七月,罗鸿绎拜望在京城做官的同乡李鹤龄时说自己有意参加这次科考,李鹤龄便向他同年考中举人、如今的同考官浦安求助。榜示出来,罗鸿绎中了第238名举人。被录取后,举子要对给自己帮忙的人有所“表示”。罗鸿绎给李鹤龄送去了500两纹银。10月初,罗鸿绎又带了10两银子给浦安。之后,罗鸿绎又来到主考官柏俊家拜访,呈上了赞敬银16两。

案情调查至此,怒不可遏的咸丰帝下旨:不论牵涉到谁,一定要严惩不贷!咸丰帝随即召见会审团成员及17位亲王和大学士,商量如何处置柏俊。大臣们默默无语。

独有肃顺起来发表意见:“科举乃取士大典,关系至重,

16两银子断送宰相性命

加科考。

这场议论持续了半个多月。咸丰帝当即任命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等四人专职会审查办此案。会审团很快查清,平龄并非优伶,只是平素喜欢曲艺,其得中举人,并无不妥之处。但重要的是,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,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。一张卷子就出现了七个错别字,如此低劣的水平,怎么还能被录为举人呢?不久,会审团向咸丰帝呈交了处理意见:平龄才华平平,不足以被选为举人;考生舞弊,同考官也应连坐,降一级调任。案情似乎就这样了结了,但一场大狱却已在酝酿中。

按规定,发榜后有关部门要对中举之人的试卷进行复核检查,这个程序称为磨勘。10月26日,会审团向咸丰帝奏报了磨勘结果:此次顺天乡试,总共录取举人300名,查出有问题的试卷竟然多达50份!作为遴选国家栋梁之才的科考,内幕竟然如此肮脏黑暗。会审团开始对这件科场舞弊

柏俊罪不可宥,非非法不足以儆在位!”当下,柏俊、浦安、李鹤龄、罗鸿绎四人就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。关键时刻肃顺为什么要落井下石呢?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平时就与柏俊立场不合,肃顺集团是要借此次舞弊案置柏俊于死地。

咸丰十年8月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。咸丰帝与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几位亲近大臣逃往承德。而在京师,以恭亲王为首的大臣暗中与慈禧、慈安太后勾结,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。因为肃顺曾劝咸丰帝效仿汉武帝死死慈禧,慈禧对肃顺、载垣、端华一派深怀仇恨。为进一步打击政敌势力,她决心对他们承办的戊午科场案进行翻案。经过反复商议,刑部、礼部两部官员终于呈交了一份奏折。呈折说,柏俊的确有舞弊之事,但按律不至于被处斩,载垣、肃顺等人有挟私报复的成分。至此,戊午科场大案也最终盖棺论定,真正沉寂下来。

(据《百家讲坛》)

◎历史趣谈

刘亚哲智斗胡宗南



胡宗南与夫人。(资料片)

1946年6月,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排除干扰,悉数释放了此前被新疆督办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及家属,计有马明方、方志纯、张子意、杨之华、高登榜、吉合等百余人。

其时,蒋介石策划的反人民内战即将爆发,政治形势严峻,张治中决定尽快护送这批共产党员回延安,委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执行。从新疆到延安,关山重重,路途险恶。但作为八年前就曾欲去延安参加革命,倾向进步的爱国人士,刘欣然接受这一任务。为此,离开省会迪化(今乌鲁木齐)以前,刘亚哲在车辆、人员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。6月10日,按预定计划,中共人员和护送班子分乘十辆卡车准时出发。

途中,护送队伍与共产党人鼎力配合,胜利通过热浪滚滚的火焰山,浩瀚广袤戈壁滩;刘亚哲还随时联系沿途驻军,以保证安全。刘并根据这批刚出狱的共产党人体质差的状况,适时提高伙食标准,坚持每日检查身体。经过二十天的长途跋涉,一行人抵达陕西省,西安指日可待。岂料,此刻刘亚哲忽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电报,电文云:“刘处长亚哲,不要去西安,要到咸阳去,那里设有‘招待所’。”刘看完电报,心

里暗暗叫苦。只因刘亚哲曾为胡的旧部,深知咸阳的所谓招待所纯属胡宗南关押进步人士的集中营,这批共产党员落入他手,性命难保。

刘亚哲正苦思良策,高登榜来见。刘直言相告:“明天不能到西安,要去咸阳。”简述缘由。高获悉事情变化,即去向党组织汇报。一小时后,杨之华闻讯赶来,她快人快语,开门见山:“刘处长,我对你有个要求,请你考虑,车上有一个病号,发烧四十多度,患的是回归热,很危险,今晚可能要死在这里,要求刘处长今晚夜行军赶到西安,抢救这个病号。他是空军人员,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,像这样的人才车上有四五十人之多。”刘亚哲听罢,心中豁然开朗:抢救病人,直奔西安这确是应付胡宗南的绝好理由,共产党组织真真办法。然而,深沉的刘亚哲没当场敲定,他回答杨之华:“请先回去,我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未几,脱险的全盘计划遂在刘亚哲胸中形成,他旋即护送班子的紧急会议,高登榜、杨之华、吉合三名中共党员作为代表也应邀与会。会上,刘宣布,因出现重病号的意外情况,故要夜行车赴西安,为保途中安全,规定行车速度,哪名司机发生车祸,定按军法从事。会前,刘亚哲电回复胡宗南,表示“遵办”,欲稳住对方。

午夜一时,车队路过咸阳,原以为在此处会遇麻烦,但特务检查站人员均沉沉入睡,无人拦截。只有一名驻军哨兵把关站岗,远远问:“什么车?”刘答:“军车”。安然过卡。就这样,车队畅行无阻到达西安。按既定方案,刘亚哲把杨之华等人送往八路军办事处,他的护送工作告一段落。次日,刘亚哲从客往见胡宗南,并告中共人员去向。胡面对既成事实,倒未追究刘的责任,只是气急败坏,在屋内走来走去,大骂:“他妈的!这些没有用的东西(指咸阳特务检查站的特务们)!”刘亚哲不动声色,继续问:“何时去延安?”胡宗南怒怒不息地回答:“听通知!”

过了几日,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,刘亚哲再次晋见胡宗南。他满怀欣喜,认为获准出发去延安了,不料,胡仍沉着脸,气势汹汹地表示:“这些人不能走,政治部有意见,要审查。”刘顶撞道:“新疆张(治中)主任审查过了,都是共产党。”胡宗南遂一时语塞,旋又要刘把杨之华引来见面,刘提醒他,杨现在在八路军办事处,胡沉默良久,不再言语。刘亚哲辞出后,仔细品味胡宗南的话,感到胡宗南是一计不成,又生二计,所谓审查,实系扣押。刘亚哲心急如火,立即奔八路军办事处,安慰杨之华等人,假说由于手续问题,而非政治原因,所以不能成行,本人当全力解决。随后,刘亚哲连连致电张治中,请示对策。

不久,经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正严交涉,张治中反复要求,蒋介石被迫指令胡宗南将滞留西安的中共出狱人员放行。及至当年7月11日,上述同志历尽艰险,终于胜利到达延安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